

栏首语

栏目主持人 田海龙

《外语与外语教学》曾在 2013 年第 4 期刊过一个批评话语分析的专栏,这一期再出批评话语分析专栏不仅是对这个学科的支持,更是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需要深入,对它的认识亦需要全面。田海龙的文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从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以及在我国的应用等方面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不失为一篇有观点的文章。辛斌的文章也对认识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该文通过讨论沃尔夫和巴赫金的语言思想来认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原则,无疑是对从社会科学角度认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补充。杨熊端和丁建新的文章继续上一个专栏关于批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结合的讨论,但更多地集中在民族志书写上面。文章通过说明人类学界对民族志文本“真实性”的反思以及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报导人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为批评话语分析民族志研究与人类学反思民族志搭建一座桥梁。如果说这三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理论层面的思考,那么本专栏的另外两篇文章则从实践层面展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解释力。钱毓芳的文章讨论英国主流报刊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问题,谭晖的文章讨论后现代建筑混合、矛盾、双重代码的话语问题。虽然这么说,这两篇文章的理论意义也是很明显的,前者凸显了话语的建构功能,后者强调了话语的多元和动态特征,而这也正是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重点。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

——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摘要: 基于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及现状的反思,本文对关于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积极话语分析关系的一些观点进行质疑,并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应用问题,强调有必要进一步确认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即批评话语分析注重探索话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这种探索要建立在扎实的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基础之上。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 积极话语分析

DOI:10.13458/j.cnki.flatt.004234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6)02-0001-09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在其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场关于其本质的讨论。第一场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唯寡森(Widdowson)为代表的一些英语语言学界的资深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声称承担的政治责任、依据的理论基础和采用的语料收集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对此进行回应的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倡导者费尔克劳(Fairclough)。第二场论战发生在 21 世纪初,发生在唯寡森、布鲁马特(Blommaert)与沃达克(Wodak)之间。第三场论战发生在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070)阶段性成果和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科研立项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作者邮箱: tianhl@tjfsu.edu.cn

2008年,由贝利格(Billig)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这篇文章对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进行话语分析时使用的语言提出质疑,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在分析话语的“名物化(nominalization)”时自己的语言也具有名物化的特征。对此,马丁(Martin)、费尔克劳、范代克(van Dijk)等学者进行了回应。通过这些争论^①,批评话语分析冲破传统语言学的重重藩篱,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脚步也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语言学研究学派。

然而,在批评话语分析从“边缘”走向“主流”的时候,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越来越为学者所接受的时候,在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越来越少而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时候,关于“到底什么是批评话语分析”、“为什么要作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以及“如何作才是批评话语分析”这样涉及批评话语分析精髓和实质的问题却一次又一次的敲击着我们的智库之门。不言而喻,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厘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认识仍然需要深入。本文以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和应用为背景,讨论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问题,以及在不同学科的应用问题,希望对涉及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偏颇有所认识,对批评话语分析实质和精髓的理解有所深入,进而更贴切地开展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工作。

2. 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韩礼德将他之前发表的一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论文集《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Halliday,1978/2001)。韩礼德的研究与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和英国社会语言学家查吉尔(P. Trudgill)一样,突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把语言研究的关注点从语言结构本身移到与语言运用相关的语境上面。然而,韩礼德对语境的关注并没有像社会语言学家那样持久和深入,而是将语境作为一个研究语言结构的参照物,其结果则是将研究的重点重新置于语言结构上面,故其研究也称作系统功能语法。尽管如此,韩礼德从语境的角度审视语言结构的新视角确实为解读语言结构与语境结构的联系提供了方法。例如,根据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及物性结构体现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语言的情态结构体现出讲话人对所谈事务的态度以及与听者的关系,语言的语篇结构可以表明人们对谈论话题的重视程度,这些都为试图解读新闻语篇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的学者提供了语言学的方法论支撑。这些学者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批评话语分析先驱的批评语言学的代表人物福勒(R. Fowler)、克瑞斯(G. Kress)、郝智(B. Hodge)和褚尔(T. Trew)。他们在批评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语言与控制》(Fowler et al.,1979)中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来分析新闻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纪念韩礼德的文集中,福勒以《关于批评语言学》为题撰写文章,指出批评语言学的分析工具大多来自韩礼德确认的表达概念和人际功能的语言结构(见Fowler,1987/1991/2012:3)。

批评语言学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分析工具的传统在费尔克劳(N. 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中得以延续。1989年费尔克劳第一次提出他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分析框架(Fairclough,1989:25);尽管这个分析框架不断得到完善(见Fairclough,2001:236;Fairclough,2003:209-210;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60),这其中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费尔克劳始终坚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提供的语言学分析工具。而且,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



能语言学的联系还成为第 28 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主题,出版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文集(Yong & Harrison 2004)。正是基于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渊源关系,一些学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张霄田海龙 2009),或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刘立华 2007),甚至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脱胎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吴梦启 2002)。然而,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视角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如果不加改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全面和实质性理解。

全面认识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需要从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背景和操作层面入手。就前者而言,需要认识批评话语分析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反叛。欧洲进入 17 世纪,笛卡尔的“现代哲学”受到吹捧,“科学”与“理性”的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进入 20 世纪,随着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人们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获得确定答案。然而,正如刘亚猛(2008: 284)指出的那样,西方世界在自认为已进入“科学”与“理性”时代之后,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亿万生命毁于一旦。残酷的事实使人们对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和道德问题产生疑问,西方思想学术界也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醒悟过来,各种“反体制”理论于 20 世纪中叶开始风起云涌,对三百年来一直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智力发起冲击,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汇集为新的主流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语言研究领域体现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思想的批判,并形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称为后结构主义(Baxter 2003: 6)。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背景下欧洲的一些语言学家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这种“带着倾向性态度”(van Dijk 2001: 96)的主观研究更有利于认识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也更有利于帮助受压迫者摆脱压迫者的控制。在这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突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语言的功能,但它更大的贡献却是它对语言结构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以及这种描述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的具体语言学分析工具。

在操作层面,批评话语分析一般要对话语(discourse)进行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根据科斯拉唯尼克(KhosraviNik 2010)的观点,文本分析就是对社会问题中涉及的文本或语体等语言运用的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找出其文本特征;社会分析是运用语言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这些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揭示这些语言特征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选择这些语言特征进行交流的目的和动机。批评话语分析这种操作方式体现出其跨学科特征,即语言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交融(张霄田海龙 2009)。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一方面从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始终坚持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这也促使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范式,如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corpus-based CDA)、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SFL-based CDA)、以及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cognitively-inclined CDA)。在这个意义上,系统功能语言学只是批评话语分析采用的一种语言学分析方法。

可见,如果将批评话语分析视为语言学领域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响应,是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批判的一个结果,是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一起同属后现代语言研究的范畴(田海龙 2014b),与美洲大陆的新修辞学运动殊途同归的语言研究方法(田海龙 2015),代表着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方向(许力生,

2013) 那么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以社会语境为参照物对语言结构的系统描述在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有效的语言分析工具的同时,也只能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所使用的语言学分析工具而已,而且还是批评话语分析几个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克劳主要使用的语言学分析工具^②。认识这一点,是认识批评话语分析精髓和实质的前提之一。

3. 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关联不像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那样渊源流长,而是源自马丁1999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③。这篇题为“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的文章于2004年发表,朱永生(2012: V)认为这是马丁第一次正式提出积极话语分析的口号。然而,马丁最早提及积极话语分析的文章“Grace: The logogenesis of freedom”(Martin, 1999/2002)则发表于1999年。由此可见,如果认为马丁在1999年开始思考提出积极话语分析,它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至2016年也只有17年,较系统功能语言学晚了许多。

积极话语分析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是在2006年。这一年,《英语研究》第4期转载了马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朱永生的文章“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朱永生,2006)。之后,黄会健等(2007)预测批评话语分析要向积极话语分析发展,并认为这是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到2012年5月中,我国主要期刊和学报已登载主题为“积极话语分析”的论文26篇,硕士论文6篇(胡壮麟,2012)。据此,胡壮麟(2012)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为我国语篇分析,特别是评价理论的应用展现新的视角,取得较大成果”。

然而,也有学者对积极话语分析的提法持有不同观点,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不仅不能实现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甚至不能与批评话语分析同日而语。例如,李桔元和李鸿雁(2014)指出,积极话语分析所含有的意义都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囊括之中,二者的哲学基础相同,研究方法相同,彼此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与批评话语分析有所区别,充其量只是分析的语料不同而已。因此,他们断言,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积极话语分析没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因此也没有发展空间。

李桔元和李鸿雁(2014)提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阅读积极话语分析的论文可以发现,马丁(Martin)之所以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一术语,其初衷就是要分析那些“具有鼓舞和鼓励作用的话语,那些我们喜欢和使我们高兴前行的话语”(Martin, 1999/2002: 197)。例如,他(Martin, 1999/2002)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的最后六段进行专业解读,使我们看到曼德拉如何使这篇文章感动人,同时也体现出他的智慧。正如马丁(Martin, 1999/2002: 196)的解读得出的结论那样,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只能是一个词:优雅(grace)。

需要指出的是,马丁提出分析那些“我们喜欢的言语”是以他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揭露那些“我们不喜欢的言语”为前提的,据此他提出积极话语分析的术语,认为可以实现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这可以从他的解释中得到印证:“在理论上我不喜欢矛盾对抗但更倾向于补充,在措辞上我不喜欢革命但愿意循序渐进。我愿意被理解为在阴阳之间的晃动——既采取解构的行动又采取建构的行动”(Martin, 2004/2012: 282)。他认为,没有积极话语分析,就不能正常理解社会如何变得更好,变好的设计就会受到阻碍,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家宁愿告诉我们如何斗争而不告诉我们如何赢得自由(Martin, 2004/2012: 282)。基于对这些论说的



解读,胡壮麟(2012)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互补关系,并从现实的CDA与非现实的CDA的互补、解构与建构的互补、坏消息与好消息的互补、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互补等方面论述了这种互补关系。

胡壮麟的这个解读很正确,马丁的初衷也没有错,而且还因提出一个新术语实现了某种创新。这个新术语是以旧术语“批评话语分析”为前提的;新旧之间的关系虽互为存在的条件,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立。如果探究积极话语分析提出的背景,就会发现马丁之所以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个新术语是因为他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揭露我们不喜欢的言语”,因而是“消极”的。与之相对,积极话语分析“分析那些我们喜欢的言语”,是“积极”的。且不说将“批评”简单的理解为“消极”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批评”的学术含义^④,单就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与之区别,实际上已经将“积极话语分析”置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对立面,不论怎样强调二者之间的互补,它们已经是处于“反义”的关系之中了。作为一个术语,“积极话语分析”虽是一个新的提法,但作为一个学派,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却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究其原因就在于,马丁把“批评”至于“积极”的对立面,而实际上,“积极”的对立面应该是“消极(negative)”而非“批评”。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9: 163)在论述“批评”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含义时指出,批评社会研究关注当今社会中的“坏事”(如不公正、不平等、缺乏自由),并且分析这些“坏事”产生的根源和原因、以及对这些“坏事”的抵抗和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既有“消极”又有“积极”的特点。

显然,“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这三对概念如果存在互补关系,只是因为彼此互为存在的条件罢了。它们实质上是处于意义相反的“对立”关系之中。但是这种“对立”关系的一方(积极话语分析)又没有任何可以独立的根基,只不过是另一方(批评话语分析)的附庸,难怪弗罗尔迪(Flowerdew 2008: 204)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对立(false opposition)”。这种“伪对立”表明积极话语分析只是在形式术语上与批评话语分析对立,在内容(如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与批评话语分析没有区别,正如弗罗尔迪(Flowerdew 2008: 204)指出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在构建更好的世界方面已经融合了积极的成分。”关于这一点,马丁也心知肚明,并把积极话语分析说成是“非现实的批评话语分析(CDA irrealis)”(Martin 2004/2012)。正如胡壮麟(2012)指出的那样,“在马丁心目中,积极话语分析实际上也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就马丁提出积极话语分析的出发点——语料——而言,对所谓“坏新闻”的批评话语分析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有时也可以具有积极意义,起到教育当事人、警戒其他人的目的(胡壮麟 2012)。

可见,积极话语分析既没有对批评话语分析实现反拨,二者之间也不是一种互补关系。积极话语分析充其量只是强调批评话语分析在语料选择方面需要更加全面,而所谓的互补关系也只是在新术语与旧术语之间有一个互为存在的条件而已。换言之,马丁以批评话语分析为参照物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个术语,实现了术语的创新。但这只是“术语”层面的创新而已,既没有带来一个新的话语分析学派,也没有为学者提供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外任何新的研究范式。

4. 批评话语分析的应用问题

厘清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以及积极话语分析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应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与方法。以上讨论可以明确,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对话

语进行文本分析非常有效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积极话语分析的提法也使我们注重分析和发现话语中蕴含的鼓舞人心的意义。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在一些批评话语分析跨学科研究的案例中,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质性理念还无法寻踪。例如,在社会学领域(如谢立中 2009),在历史学领域(如杨念群 2013),在文学领域(如高玉 2009),在教育领域(如但昭彬 2008),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运用了话语分析的方法,而且对话语的建构性、实践性、以及不同话语之间的关联性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但是,如果说体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和实质,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话语分析,还为时尚早。

例如,但昭彬(2008: 9)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宗旨的发展与流变时,聚焦文献、文本和文化,坦言“采用的话语分析方法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他认识到,批判性话语分析就是要弄清楚是什么社会政治因素使得人们这样言说,并且从语境、文本、文化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在语境层面,通过对文献文本的分析,探究“何以言说,是谁在言说,是在什么样的客观背景下言说的”,进而把握文本的生产过程;在文本分析层面,观察文本的特征,探究作者是如何言说的;在文化分析层面,探究文本的寓意,深入挖掘言说(文本)之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但昭彬 2008: 9-10)。但昭彬(2008: 99-111)在分析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时,就从“何以言此、如何言之、有何寓意”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篇文章的时代语境、话语特征及其所蕴含的义蕴。如果遵循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该文的“话语特征”的分析目的在于探究该文产生的过程以及所蕴含意识形态意义的基础,而对“话语特征”的分析亦需依据一定的语言学分析工具。然而,这里看不到“如何言之”与“何以言此”、“有何寓意”之间的联系,至于对“如何言之”的分析,我们也只能看到作者的分析停留在“对语词的敏锐观察”上面,没有通过任何的语言学分析“去磨锐我们对现象的知觉”(但昭彬 2008: 102)。下面是他的文本分析。

梁启超撰写的这篇《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洋洋七千余言,全面探讨了教育宗旨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教育宗旨观。他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将何谓宗旨、何谓教育作了一番解释。

何谓宗旨?他先用一个问句开篇“人之所异于群物者安在乎?”随即对何谓宗旨进行了解释“凡物之动力……。”接着,他连用八个“或”字来说明“宗旨之或有或无,……。”然后,他连用六个“无”字来论述宗旨之重要“无宗旨则所用其耕,……。”

那么,教育有何意义?他又作了这样的解释“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在此引出关键词——“教育宗旨”。

教育如果没有宗旨会怎么样?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由此引出了本文的中心议题——“教育当定宗旨”。他发出了“第一当知宗旨。……第二当则宗旨。……第三当定宗旨”的呐喊。这三个铿锵有力的祈使句,给人以镇聋发聩之感!以下加以逐条分论。

(但昭彬 2008: 102-103)

可以看到,尽管作者理解到“话语特征”涉及词语、句法、陈述、叙事、文体等元素(但昭彬 2008: 102),作者对“话语特征”的分析也只是集中在对使用的隐喻、以及文章结构和“连用几个字”这样的句式的观察。对隐喻的分析没有运用认知语言学分析文中的隐喻分析方法,对文章结构和句子的分析也没有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常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语言分析虽涉及文本的修辞,但对逻辑推理的分析也没有达到深入的地步。

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是兼收并蓄的,依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所观察的语料而定,没

有固定的模式。但是 我们依然相信 批评话语分析不论在研究方法方面 还是在研究目的方面 还是有章法可寻的。这促使我们思考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所在: 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批评话语分析?

5.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我见

对于这样的问题 上面对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已经提供了答案。首先 在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联系方面 我们要强调批评话语分析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事实 强调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避免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混为一谈。这一点在我国的外国语言学领域尤其需要强调。同时 我们还要强调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批评话语分析在方法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系统功能语言学较其他语言学分析方法在我国的外国语言学领域有深厚的基础 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当然 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方法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不应纠缠在解构还是建构、积极还是消极上面。一切有深刻社会关切的话语分析都可称为批评话语分析。

其次 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般常识性的分析 它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谓科学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为工具的研究。对批评话语分析而言 就是要采用一定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进行话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 文本是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因此 要探究社会实践的轨迹必须要对其文本痕迹进行分析。任何可以称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文本的充分、透彻、扎实、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基础之上。

综上 可以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就在于它既注重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 又植根于扎实的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即“话语的社会功能”(田海龙 2009)或“话语功能性”(Tian 2006; 田海龙 2012) 并不是指语言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 或由语法、语义等范畴实现的语言功能 而是指话语在参与和再现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关系及社会身份中所发挥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对这些话语作用的探究离不开探究话语作用实施者的地位和权力及其所持有的价值取向 因此批评话语分析不是脱离社会关切的话语分析 相反 它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科学领域中福柯传统的话语分析的基本特征。但是 批评话语分析毕竟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范式或学派 这决定了批评话语分析以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为基础。如果放弃了这个基础 也同样失去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批评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属于“质的研究” 需要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也需要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分析进行扎实的语言学分析(田海龙 2013)。如果说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的概念将其与其它话语分析区别开来 那么 批评话语分析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也将其与其它批评话语研究区别开来(Hart & Cap 2014: 2)。只有如此坚持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和原则 才能完成批评话语分析解构与建构的社会实践 才能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注释:

①关于这三场论战的介绍可见田海龙(2014a: 28 - 32)、田海龙和赵芑(2012: 10 - 13); 关于这三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可见田海龙和赵芑(2012: 111 - 177)。

- ②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使用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之一。之所以是之一,是因为费尔克劳还特别强调要使用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如论证和推理(见 Fairclough 2014)。
- ③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的地点,朱永生(2012: V)说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而同一本书中,马丁讲这次会议是在英国的伯明翰(Martin 2004/2012: 003)。
- ④关于“批评”的学术含义可参见赵芑和田海龙(2008)、Chilton 等人(2010)、田海龙(2009)。

参考文献:

- [1] Baxter J. 2003. *Positioning Gender in Discourse: A Feminist Methodology* [M]. New York: Palgrave.
- [2] Chilton P., H. Tian & R. Wodak. 2010. Reflections on discourse and critique in China and the west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4): 489-507.
- [3] Chouliaraki L. & 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4]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5] Fairclough N.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 S. Yates (eds.). *Discourse as Data* [C]. London: Sage.
- [6]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7] Fairclough N.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C]. London: Sage.
- [8] Fairclough N. 2014. Review of Siobhan Chapman's *Susan Stebbing and the Language and Common Sense* [J]. *Discourse & Society* (3): 408-411.
- [9] Flowerdew J. 2008.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A]. In V. Bhatia, J. Flowerdew & R. Jones (eds.). *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 [10] Fowler R., G. Kress, B. Hodge & T. Trew (eds.).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C]. London, Bost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1] Fowler R. 1987/1991/2012.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12] Halliday M. 1978/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13] Hart C. & P. Cap. 2014. Introduction [A]. In C. Hart & P. Cap (eds.).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14] KhosraviNik M. 2010. Actor descriptions, action attributions and argumentation: Towards a systematization of CDA analytical categor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 55-72.
- [15] Martin J. 1999/2002. Grace: The logogenesis of freedom [J]. In M.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3)*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6] Martin J. 2004/2012.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A]. In Z. Wang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C].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17] Tian H. 2006. *Functionality of Discourse: A Study of SARS Discourse and the Anti-SARS Social Practice* [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 [18] van Dijk T.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ition)* [C]. London: Sage.
- [19] Yong L. & G. Harrison (eds.). 2004.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C].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 [20]但昭彬. 2008. 话语与权力: 中国近代教育宗旨的话语分析[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21]高玉. 2009.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2]胡壮麟. 2012. 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互补性[J]. 当代外语研究 (7): 3-8.
- [23]黄会健 冷占英 顾月秋. 2007. 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从批评话语分析到积极话语分析[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 (1): 1-6.
- [24]李桔元 李鸿雁. 2014.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J]. 外国语 (4): 88-96.
- [25]刘立华. 2007.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 5-9.
- [26]刘亚猛. 2008.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7]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8]田海龙. 2012. 话语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6): 8-11 22.
- [29]田海龙. 2013.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6-10.
- [30]田海龙. 2014a.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思考、应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31]田海龙. 2014b.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6): 14-20.
- [32]田海龙. 2015. 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J]. 当代修辞学 (4): 32-40.
- [33]田海龙 赵芑. 2012. 批评性语篇分析: 经典阅读[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34]吴梦启. 2002.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文本研究系统[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 58-62.
- [35]谢立中. 2009.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 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6]许力生. 2013. 话语分析面面观: 反思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 135-143.
- [37]杨念群. 2013. 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第2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8]赵芑 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J]. 南京社会科学 (8): 143-147.
- [39]张霄 田海龙. 2009. 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渊源看其跨学科特性[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4): 65-67.
- [40]朱永生. 2006. 积极话语分析: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J]. 英语研究 (4): 36-42.
- [41]朱永生. 2012. 导读[A]. In Z. Wang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C].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Revisiting the Tenets of CDA: A Discussion of Three CDA Related Questions ,p. 1. *TIAN Hailong*

To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in China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certain view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CDA with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and with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PDA) . It also discusses issu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of CDA in researches in various fields. In so doing ,it highlights the point that the tenets of CDA need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which are basically 1) exploring the function of discours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and 2) this exploration is based on substantial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xt and talk.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Whorf ,Bakhtin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10. *XIN Bin*

Though rarely mentioned or acknowledged ,critical linguistics (CL)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have been heavily indebted to Whorf and Bakhtin's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which include (1) language is saturated with ideology and different ways of speaking represent different analyses and views of experience; (2) varieties of language reflect and express differences in social structure; (3) language use is a social practice which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society but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social process; therefore (4) language and its use are socially constitutive as well as socially constituted.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relate CL and CDA to Whorf and Bakhtin's relativistic view of language ,thought and society along those lines mentioned above.

Key Words: linguistic relativity; heteroglossi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search of Ethn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19. *YANG Xiongduan & DING Jianx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ethnographic reality leads to the recognition of ethnographic subjectivity in academic discussion. Besides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long with ethnographers' rhetoric strategies for holding discursive power in academia are disclosed. Anthropologists' rethinking of ethnography in the 1980s opened the possibility of ethnography and culture writing as analyzed target. This transition has not only provid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research topic ,but also provided anthropologists a new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y ,which creates the opportun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thnographic reality; discursive power in Academia;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Low Carbon Economy in British Mainstream Newspapers ,p. 25. *QIAN Yufang*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British mainstream newspapers since 2000. In order to observ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se newspapers and explore the social reality reflected by the mediated political discourses ,this research merges the methods of corpus and discourse studies. It is found that mediated political discourse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discourses ,i. 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media discourse. The agenda of low carbon economy set in these newspapers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voi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public low carbon awareness.

